

经典

松本清张：以社会性拓宽推理小说创作之路

□李德纯

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1909—1992)原本以纯文学进入文坛,未几把眼光投向推理小说,使日本推理小说整体发展和影响力都得到了新的提升。

松本清张前期作品可归纳为两大类:一是历史小说,如《西乡钞票》《集抄》《战国权谋》等作品都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二是刻画逆境中的人物,以其生活道路和失败命运为中心,表现他们高尚痛苦的心灵变化轨迹,写出了现实人生的真实一面,代表作品有《某(小仓日记)传》《菊花枕》等。松本清张表面写的是历史事件和人物,却以当代脉动的敏锐感,折射战后初期日本现实话题。他说:“写历史小说和写现在题材小说并无本质不同。我企图在特定背景下借用历史题材,塑造作为一个作家所渴望刻画的艺术形象。”

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摆脱单纯侦破案件的拘囿,以批判现实主义手法,从不同途径获得的第一手官方档案卷材料,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去伪存真,表现出难能可贵的超越,在日本推理小说作家中无人能望其项背。他的作品力求给读者以积极的人生启示,是对过往推理小说的反叛与校正,具有纠偏补弊之功。作品描写犯罪,没有停留在出于个人恩怨、桃色纠纷或图财害命等情节,而着重揭露官僚政客出于政治上的阴谋诡计而杀人灭口,体现了一种朴实而严肃的美学追求,拓宽了推理小说的表现领域。他在长达59年的文学生涯中,引领了一个新的阅读与写作潮流,留下许多经典之作,成功地将此前备受争议的侦探小说转变路径,显示了文学作家应有的高端素养和拥有的艺术功力。

1946年,“变格派”推理小说家木木高太郎主张提升侦探小说的艺术性,提议将改进创作后的作品称为推理小说,文坛对此反应冷淡。不久,日本实行文字改革,“侦”字被废止,文艺界改用推理小说一词。日本的推理小说也是舶来品,明治十年(1877年),神田孝平在《花月新志》上发表了《杨牙儿奇谈》,应为日本推理小说领域的开山之作。这篇小说是根据荷兰法制题材小说《荷兰美政录》中的一章编撰的。1888年黑岩岩根据欧美作品改编了大批小说,其中有《岩窟王》(即《基督山恩仇记》)最为脍炙人口,使得侦探小说风生水起。当时,日本处于穷途末路的一批无聊文人也随波逐流涌入推理小说的创作洪流中,文学家把此类作品称为“庸俗低劣的推理小说”。大正年间一些极负盛名的作家也受到影响,芥川龙之介的《草虫》《影》《开化的人》,

谷崎润一郎的《陈述》《指纹》《母》等亦受侦探小说的影响,但推理小说起步文坛是从江户川乱步开始,发展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派:一是以注重分析和逻辑性的“本格派”(即正统派之意),代表作家有江户川乱步和岛田喜久雄等;二是靠惊悚和强烈戏剧冲突为特点的“变格派”,代表作家为横沟史、木木高太郎和久生十兰等。

日本推理小说的创作逐渐成熟的过程中也出现同质化、平庸化倾向,作家欠缺文学的个性化艺术风格,在语言和叙述上惊人的相似,陷入套路,缺失自己的美学。更有甚者,只追求远离现实生活的猎奇斗艳和肤浅滑稽的情节,只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无法触动他们的心灵。“社会派”的松本清张同“本格派”和“变格派”在审美品格、思想意蕴、道义追求和实践取向等方面存在差异。松本清张的作品在故事情节开展上多有波折,对结果的揭示隐而不发,而通过内在逻辑和因果关联,再融入丰富的想象力,使结局自然合理。而“变格派”架空真实时空,靠偶然巧机推动剧情的发展,悲剧的结局、灰暗的人生早已在故事尚未充分展开时便已显露出来,更多的沦为别种类型叙事如爱情叙事的附庸与点缀,常常是荒谬得被排斥在现实可能性之外,略显碎片化。

匠人进行旧技的重复,大师正在追求创新。松本清张撰文称:“文学应是揭发的文学”,“与其追求文字的雕琢,还不如写真实”。他认为,此类小说运用推理案件拨开疑云迷雾,去疑解惑,对侦破犯罪过程的重视基于结果,借助情节悬念丛生,进展很自然融入读者的想象空间。同时,他还强调对作案动机的分析,不但对作案人作内心剖析,尤其在深入挖掘犯罪的社会原因。他曾以冷峻的笔触直陈过去的推理小说利弊:“我认为探讨犯罪动机和塑造人物是相辅相成的。当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就形成了犯罪动机。但是,过去总把犯罪动机千篇一律归结为个人原因,比如为了流连纸醉金迷去图财害命,或出于庸俗不堪的艳事而杀人,庶几乎成为一种公式,没有特殊性。对此,我是不满意的。我认为,除了动机,还应加上社会性,这样,推理小说的路子就宽多了。”他正视现实,深究造成犯罪的社会原因,在立意、人物、意境设置等方面着意变革,加快推理小说写作转型。他的《点与线》《墙壁有眼》等,充满了令人惊叹的阅读震撼,在社会上掀起了“松本清张热”。

被评论界称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的《点与线》,最能体现松本清张的创作功力。



松本清张

《点与线》中,中央某部主任同机械设备公司经理安田辰郎内线交易弊案事发,安田夫妇把知情的代理科长佐山宪一和小雪餐厅女侍阿时诓骗到九州岛深山,用掺有氰化钾的橙汁分别毒死这两个根本没有爱情关系的男女,然后移尸一处精心埋设伏笔。警方最初却把这种虚假现象视为破案线索,然而暗礁都藏在不易觉察之处,随着奸商夫妇渐渐浮出水面,负面猜测被消除,他们觉察到大祸临头服毒殒命,读者只能在书的末尾才能得知分晓。

松本清张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没有对暴力和色情的渲染,使读者平静地享受逻辑推理的乐趣。如果说,他在早期作品中所发出的切切哀诉,还只是对时代和整个社会的泛泛之声,那么,后期他对所处时代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找准了抨击目标,使推理小说跳出了侦探破案的框框,第一次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历史作为叙事主体。这是松本清张一次真正的思想飞跃和创作挑战。从小说题材和内容上看,他后期的创作分为三大类,均着力表现了风起云涌的大历史中不为人知的细节:《日本的黑雾》拂去历史的尘埃,对美国占领日本时期的所作所为穷追不舍,揭露扑朔迷离且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对长期流行的观点作最新阐释,《点与线》《墙壁有眼》等作品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法则和细节的真实,揭示时代的痼疾;《日本官僚论》等则

生动描写日本中央12个部委的官场生态细节,准确把握官员人性和官性的矛盾统一,展现了一幅日本当代政治生活的全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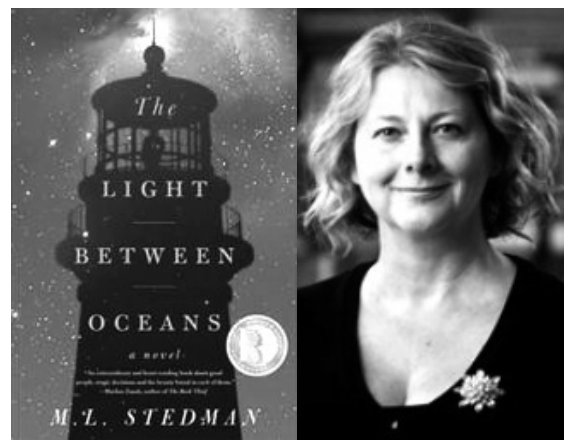
松本清张的现实题材报告文学《日本的黑雾》对美国占领日本初期扑朔迷离的事件真相进行挖掘与还原。其中的“帝国银行事件”之谜讲述1948年1月,一名中年男子在帝国银行东京椎名町分行,声称奉美军总司令部之命,给该行16名职工服用预防流感药水,其中12人离奇死亡。书中人物的死亡形式恰好成为松本清张了解、探求历史真相的一个隐秘窗口。他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把能够掌握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从纷繁复杂甚至互相矛盾的材料中跳出来,形成自己新颖独到的见解:二战前在中国东北的日本细菌部队,在美军招降纳叛下继续从事细菌武器的研究。“帝国银行事件”就是用这种细菌配制的药水做人实验。

历史不该被忽略与遗忘。松本清张在《日本的黑雾》中,不使用任何虚构内容,而是援引官方文献资料,综合分析每个事件的前因后果。作者在书的跋中谈了自己的创作初衷:“我不是在举笔之初,就怀有反美观点的,也不是一开始就用‘占领军的阴谋’这把尺子来衡量一切的。我只是在调查每起事件的来龙去脉后,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独白为美国军事占领日本时,松本清张的忧国伤时心境提供了新的认识视角。

松本清张在后期对日本现代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审美视野相当开阔,在文学和历史间纵横驰骋。

松本清张的创作风格,深受他喜爱的本国和外国作家的影响。在日本作家中,他对芥川龙之介、森鸥外和菊池宽等现代文学大师推崇备至。日本文学评论家认为,他对日本文学独具特色的“私小说”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后期作家及其作品持批判态度,敏于对社会问题和艺术审美的思考。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的作品表现出与“私小说”缺乏对社会和人生的深刻探讨大相径庭的特点。松本清张打破了日本文坛受传统偏见左右、对大众文学多有鄙视的局面,开创了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而他的创作经验对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与繁荣深具启迪意义。他对外国文学也有浓厚兴趣,年轻时曾广泛涉猎陀斯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的作品,尤对高尔基的《夜店》爱不释手。美国作家爱伦·坡也受到松本清张的推崇,但他的推理小说同西方的探案推理模式不同,有着日本式的逻辑思维 and 东方神秘色彩。

域外传真



《大洋之间的灯光》英文版 M.L.斯特曼

M.L.斯特曼(M.L. Stedman)生于西澳大利亚,目前定居伦敦。她的处女作《大洋之间的灯光》(The Light Between Oceans)于2012年3月出版。该小说一经出版就获得评论界和普通读者的如潮好评,并迅速登上《纽约时报》十大畅销书榜单。目前,该小说已被译成30多种语言,在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意大利、丹麦、加拿大等国也一直名列畅销书之榜,大有风靡全球之势。梦工厂正致力于该小说的电影制作。“萦绕于怀”、“海雾朦胧”、“肝肠寸断”是读者评价斯特曼这部处女作最常用的词语。故事发生在斯特曼的家乡,西澳大利亚海岸线附近的小岛上,主人公是一战后退役的老兵和他的妻子,他们安家于前哨基地,虽没有子女与其共享天伦,但却婚姻美满。不过原本过着平静生活的他们,却由于一个惊人的决定,被卷入一场场云谲波诡的事件中。应《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文学编辑马乔里·科赫之邀,斯特曼就《大洋之间的灯光》接受了专访,谈了她的处女作、世界观,以及如何实现从律师到作家的华丽转身。

从律师到作家的华丽转身

——M.L.斯特曼访谈录

马乔里·科赫(以下简称“科”):《大洋之间的灯光》这个故事是如此的美意朦胧,感情强烈,从某种角度来讲,也很与世隔绝。您是如何获得创作灵感的呢?

M.L.斯特曼(以下简称“斯”):对我而言,写作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我只需要跟随着脑海中闪现的一幅图画、一个短语或是一个声音游走。在创作这部小说时,我闭上眼睛就能看见一座灯塔和一个女人,我能断定,那是在遥远的过去,在西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岛上。而后,一个男人又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能觉察到他是一个守塔人,而且故事是以他为主线展开的。然后,一条小船被冲上了岸,船里有一个死去的人。我继续向船的深处看,发现还有一个活着的婴儿。我不停地写下去,就是为了弄明白,这些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人们究竟是谁,事情究竟会怎样发展下去。

科:您所塑造的几位人物都遭遇了严峻的道德考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做出了糟糕的决定,但到故事的尾声,我们渐渐地理解了他们,并发现他们都是有着同情心之人。您认为这是对您世界观的反映吗?

斯:这种情况就仿如那句格言:“要设身处地地换位思考。”我认为人性本善。当然,对于善的看法可能因人而异,甚至有天壤之别。但我坚信,那些误入歧途的人也同样能够获得他人的怜悯和同情。我并不是说纵容恶劣行为的行径。但是我们要明白,做人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艰辛的课题,更何况“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当我们都心怀一颗同情之心时,怜悯和宽容就会治愈这个社会。

科:故事主要是关于爱的丧失,或者说对丧失爱的恐惧。您认为这种恐惧是人类经历的内在驱动力吗?

斯:你可能会害怕失去你所拥有的爱,因此我认为,这种恐惧的驱使作用恐怕是早已先行一步。从最宽泛的意义讲,爱能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爱不仅仅是索取,也是给予。爱用它无限的表现方式赋予我们的生命以真谛。

科:小说中的情节刻画,既逻辑缜密又干净利落。您在细节掌控方面能够做到如此滴水不漏,您是否认为律师的职业影响了您的写作风格?

斯:我喜欢将情节描述得饱满充实。我认为我在法律方面的素养影响着我的写作,最为明显的是它能让我更自由、更自在、更自发地去写作,而不需要事先详细地构思情节。律师可能擅长于组织行文的结构,因此文学创作更像是本能的反应,而不是深思熟虑的产物。你说得很对,法学上的训练确实在细节的处理上有所助益,它会让你行文内容前后一致,避免自相矛盾。

科:谈及这部小说的场景,全书似乎浸润着爱,是因为海滨的景色对您有特殊意义吗?

斯:没错!每当我身处海滨,我总是幸福满怀!西澳大利亚的纯美景色曾伴随我的成长,因此能够将这美景载入纯文字,描述我终生所深爱着的这片土地,我的确是乐在其中。

科:您最敬仰的作家有哪些?您认为他们之中有谁影响了您的这部作品?

斯:我能想起来的特别喜欢的作家有(排名不分先后):格雷厄姆·格林、乔治·艾略特、欧内斯特·海明威、F.斯考特·菲茨杰拉德、科马克·麦卡锡、简·加达姆、安德烈·纪德、伊恩·麦克尤恩、伊迪丝·华顿、凯瑟琳·曼斯菲尔等等。我认为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拥有对世事无所畏惧的目光,对人类心灵的洞悉,对语言的娴熟驾驭。这些品质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受益匪浅。因此,我要重现这些品质,哪怕仅仅是蛛丝马迹,以绘读者。

(孟宪华 李阳 译)

天涯异草

贝尔蒙多,友谊的雕塑家

□沈大力

——先生,您的铅笔可能多得没处用了!

一场误会,几分诙谐。我和罗布莱斯听了一同哈哈大笑。

罗布莱斯和贝尔蒙多均为曾在阿尔及利亚长大的法国人,俗称“黑脚丫”。他跟我谈到两人在北非国度的过往轶事和亲密友谊,介绍了贝氏漫长的艺术生涯。

贝尔蒙多1898年8月8日出生在阿尔及尔,4岁开始画画,7岁崭露头角,显出特异的雕塑天才。他毕业于巴黎美术学院,1956年荣获巴黎市美术大奖。他承继其师查理·德斯彼奥在雕塑上细巧和谐的古典形态美,发扬罗丹浪漫的表现主义传统,复兴20世纪法国雕塑艺术,从而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登上光明城形象艺坛的高峰。他相继为高乃依、米舍奈、普鲁斯特、瓦多、戴高乐和特洛亚等众多名流造像,一些大型组雕作品多分布在巴黎、尼斯、南锡、图鲁兹等城市的广场和街道,为广大民众观瞻。有一天,他领我去巴黎大歌剧院卡尼埃宫看大门右侧的驰名雕塑《舞蹈》。人们一般以为是鲁德夫大雕塑家卡尔波1869年的作品。事实上,卡氏原作一直深藏于卢浮宫中,鲜有人知。现今摆在在大歌剧院前,四季供游人叹赏不已的《舞蹈》,原是贝尔蒙多的仿作,与卡氏原雕神似,毫无二致。不难明白,这也正是巴黎市政当局在法国众多雕刻家中挑选贝尔蒙多来雕塑周恩来像的缘故。

197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法国政府为周恩来总理故居大理石纪念碑落座举行了盛大的揭幕仪式,但那样隆重的场合却不见理应出席的浮雕像作者贝尔蒙多的身影。显然,他不肯当众承受人们对他艺术家智慧与才华的赞誉。我知道,那日凌晨,他曾独自一人漫步到意大利广场文德普鲁瓦旅馆门前,静静地仔细审视一天刚刚镶嵌好的周恩来浮雕像,流连许久才默默离去。老人孤单的行踪杳无音讯,似乎无人知晓。当天下午4时许,意大利广场的街心花园挤满上千群众。中法两国元首在热情洋溢的气氛里发表讲话,三位当翻译的都是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六四届的同学,一起在巴黎见证了这次中法友谊难忘的历史场面。那天,手捧鲜花的集会者齐将目光投向周恩来精美的墨绿色纪念石碑,一睹已故中国总理气宇轩昂、青春常在的浮雕遗像,却不曾想到其作者保尔·贝尔蒙多,而我内心知道那是斯人辛苦劳作、卓绝艺术的结晶。

我几度凝眸周恩来总理的浮雕像,感觉与中国大使馆提供的照片比较起来,作品上人像显得更为年轻,更倾向于周恩来于上世纪初旅居巴黎时的面貌,便向贝尔蒙多说了。他一听我的看法,如释重负,说:“如果是那样,我就太幸福了。不过,我总觉得这次时间过于仓促。不然,我可以制作一座跟周恩来等身的塑像,表现他的伟大。”

贝尔蒙多很关心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中国政府代表团访法期间,法方安排了一些介绍中国文化传统的电视节目。他从中看到云岗石窟,对姿态万千的佛像赞不绝口,称那是一座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杰作,连连感叹:“在这般伟大的作品面前,我们自己显得多么渺小啊!艺术创作是永无止境的,要不断向更遥远的境界、更奥妙的尝试探索。”他渴望在巴黎看到中国造型艺术展览,特别是中国古代传统雕像的仿制品。我赠送他一部《云岗石窟》画册,老艺术家翻看时喜形于色,表达自己想亲自前往中国山西大同云岗,深入到那50余座洞窟中观赏数万尊佛像的心愿。一念及此,他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年龄。

感于这位法国老雕塑家的至诚心迹,我回到北京后便专程去拜见时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扬。周扬立即决定,由中国文联正式向贝尔蒙多发出访华邀请,而且作出了派专人陪同他去云岗石窟参观的具体安排,日程让贝翁本人根据身体状况提出。贝尔蒙多接到中国方面邀请他访华的公函,其兴奋程度可想而知,只需要确定启程日期了。

1980年12月中旬,我应约到他在塞纳河畔法兰西研究院马扎兰圆穹顶下的另一处画坊会面,具体谈他访华事宜。贝尔蒙多提及自己为周恩来总理刻的浮雕像,想把浮雕面积缩小,铸成铜质纪念章,再在背面刻一句反映周总理精神的格言,到访华时赠送给中国人民留念。万事俱备,只待东风。不料,没过几天,1981年元旦,我突然从好友罗布莱斯处获悉保尔·贝尔蒙多当日猝然逝世的噩耗,悲感不已,且为他未能实现访华,赴云岗石窟的宿愿抱憾之至。老雕塑家的妻儿将他安葬在巴黎蒙巴纳斯公墓,离萨特的坟地不远。后来,我归国之前赶到蒙巴纳斯墓地向故人亡灵辞行,见其坟头上尚未竖立石碑,只得伫立标识逝者姓氏的荒草地上含泪默哀,痛失罗布莱斯习惯称呼的另一位“太阳兄弟”!

回到北京后,我写下了《悼保尔·贝尔蒙多》,连同先期刊于《人民日报》“大地”版的《匠人雕出伟大的生命》一文,权充我向逝者供奉的心香。

过后几年,我跟罗布莱斯一起怀念共同的亡友贝尔蒙多,他说老艺术家的公子,著名男影星让-保尔·贝尔蒙多曾向中国驻法大使馆要过我纪念他父亲的文章。到1995年秋天,上海电视台一个班底到巴黎拍摄纪录片《伟大的足迹》,我妻子董纯同让-保尔·贝尔蒙多联系,请这位“影帝”在片中追述他父亲雕刻周恩来总理像的往事,双方合作十分融洽。他深情地说:“父亲构思雕塑那一阵,我们全家都像着了国迷,饭桌上谈的都是中国话题。”“影帝”小贝尔蒙多像他父亲一样谦逊,听从上海导演指挥,丝毫没有“阿兰·德龙派”的傲慢架势。纪录片里,他已见证者的身份,生动讲述了父亲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总理周恩来造像时表现出的对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崇拜。当他听说自己因《王中王》等一系列影片在中国远比其父闻名时,顿时感到异常惊诧,坚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电影演员”,不可与他父亲那样高层次的大艺术家相提并论,更难同日而语。

《伟大的足迹》一片在国内上海等地播映后,让中国广大观众得知,曾有一位法国雕塑艺术家贝尔蒙多在周恩来赴访为中国革命“西天取经”的旅途上,竖立起了一座华夏和法兰西两大民族友谊的里程碑。今朝,在纪念中法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更多人要来到巴黎艾德弗鲁瓦街前瞻仰中国总理的肖像,在光明城重温这位已故伟人风华正茂之年的豪言壮语:“愿相会于中华腾飞时!”

当时,笔者忆及周恩来总理那首慷慨激昂的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大矣哉!惟愿国人永志不忘贝尔蒙多翁生前在这其中洒下的心血。

岁不我与,到今年1月27日,中法建交已经整整50周年了。遥想昔日戴高乐将军远见卓识,在西方世界率先承认屹立于东方的新中国,我辈才有幸踏上法兰西的沃土,结识卢梭和伏尔泰故国诸多志士仁人,其中就有曾为周恩来总理塑像的法国当代罗丹派杰出艺术家保尔·贝尔蒙多。而今回首,彼时情景历历在目。

“保尔,你在想什么呢?”妻子玛德莱娜见雕塑家贝尔蒙多自傍晚回家后一直在沉思冥想,惊奇地问丈夫。

“我在想周恩来!”雕塑家如梦初醒般回答道。

我恰是在此际登门拜访贝尔蒙多的。其时,他受巴黎市政府之托,着手雕刻周恩来的浮雕像,准备安放在已故中国总理于1922年至1924年下榻的巴黎第十三区戈德弗鲁瓦旅馆门前。为此,中国驻法大使馆向雕塑家提供了一张周恩来的正面照片。懂行的人都知道,这无疑增加了雕塑者实际处理的难度。况且,给他的设计时限仅有一周。短短几天里,贝尔蒙多黎明即起,在他位于巴黎城南丹斐尔·罗什霍林荫大道上的工作室里素描了一幅幅周恩来肖像,制出一个又一个圆形浮雕,凝神聚思地反复比较和修改,最终为浮雕像整体轮廓定型。这期间,我曾跟贝尔蒙多的挚友,龚古尔文学院院士埃·罗布莱斯一同在贝尔蒙多的雕刻室里观看他身穿白色工作服辛勤劳作。

“要雕出周恩来的真切肖像,”他停下手中的刻刀,歇息片刻,转过身来朝我们说,“我先从不同角度画了十几幅周的素描像,反复选择,力求让更多的光线聚集到他的面庞上,通过明暗的形象辉映出他的内心世界,他的活力,他的精神。”

这番话透露出贝尔蒙多对周恩来雕像一事的高度重视和在雕刻艺术上的精益求精。他特别对我这个年轻中国来客坦言:“我有幸跟周恩来同龄,可惜他早逝了。过去,我曾通过阅读书刊了解到他的人格。这固能为他塑像,感到非常自豪。我是怀着双重兴趣来接受这项任务的。首先,我崇拜这位伟人。周恩来不仅受到中国大众的爱戴,而且也为法国人所尊敬。”说着,他将我国驻法大使馆提供的那张周总理相片递给我看,接着又说道:“这是一张正面标准相片。一般说来,雕人物侧面像容易成功。眼下,我面对一件颇须创作力的工作,有些心焦,怕最后雕不成功。”

贝尔蒙多待人是那般谦逊,总把沙发让给来客,留一把硬木椅自己坐。他在这座画坊里淡泊度日,虽已年过八旬,也不雇人服役。冬天连暖气设备都没有,全靠自己动手费力生煤炉。在同我和罗布莱斯交谈中,他强调艺术家的天职不可以赚取金钱为要义,否则就会丧失灵魂,不成其为艺术了。在他看来,艺术应当反映真实,要有感染力,为大众服务。他的信守箴言是:“艺无止境”,循此道孜孜不倦地追求,有时还闹出笑话来。这方面,他讲起几则自己苦练绘画的趣事。一次,他乘坐地铁,目光在乘客中不断找寻速写对象,竟然在检票员查票时从口袋里胡乱掏出几天前画的一张素描裸女图出示,令对方瞠目结舌,旁观者也霎时莫名其妙。另一天,他进入地铁车厢,习惯地掏出纸笔,聚精会神地速描坐在对面的一位年轻女子,不料惹怒了妙龄女郎。

——你这个流氓!干吗老盯着我看?
——我在画您的芳容。